

科学研究方法十讲

——中国近代经济史专业
硕士研究生参考讲义

严 中 平

人 民 出 版 社

科学研究方法十讲

——中国近代经济史专业
硕士研究生参考讲义

严 中 平

人 民 出 版 社

封面设计： 苏彦斌

科学研究方法十讲

KEXUE YANJIU FANGFA SHIJIANG

——中国近代经济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参考讲义

严 中 平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张家口地区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6.375印张 161,000字

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12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5,401—15,500

书号4001·570 定价1.10元

目 次

第一讲 关于几个一般问题	(1)
一 不过是家常	(1)
二 历史出科学	(3)
三 普及和提高	(6)
四 治学作风	(8)
五 史料问题	(11)
六 对口和兴趣	(18)
七 集体写书	(20)
第二讲 关于学科研究对象	(24)
一 经济史的研究对象问题	(24)
二 经济发展史是历史曲线的中轴	(32)
三 马克思在经济史研究的基础上形成 对现实问题的洞察力	(38)
四 经济史是中国历史研究的突破口	(44)
第三讲 关于选择研究题目	(48)
一 按照认识事物的正常秩序,从小处着手	(48)
二 明确普遍联系的全局观点,从大处着眼	(52)
三 典型研究的目的性、代表性和局限性	(56)
第四讲 关于校核前人论据	(62)
一 校核前人论据的必要性	(62)
二 由于疏忽形成的论据失误示例	(64)
1. 曲解引伸,主观臆断	(61)

2. 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66)
3. 时代失考, 结论失误	(69)
4. 以讹传讹, 纯属于虚	(72)
5. 宁左勿右, 脱离实际	(75)
第五讲 关于积累文献资料	(79)
一 工作提纲和分工协作	(79)
二 舍弃成见, 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反复中锻炼 对资料价值的判断力和敏感性	(83)
三 明确历史记载的确切含义	(86)
四 广征博引, 比较对照, 去伪存真	(90)
第六讲 关于分析方法	(99)
一 追踪历史过程的依次发展阶段, 通过事物 的历史联系去探索事物的逻辑联系	(99)
二 多级加工, 分阶段地总结写作, 强迫自己进行 全面的、深入的、系统的、周密的逻辑思考	(102)
三 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先进性, 历史正当性和 历史反动性	(104)
四 破除陈见, 力求创新	(113)
第七讲 关于理论联系实际	(117)
一 结合历史实际去体会经典理论的精神实质	(117)
二 明确概念和实际之间的“渐近线”的关系, 避免从定义出发	(127)
第八讲 关于历史规律问题	(133)
一 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133)
二 中国历史上的特殊规律问题	(140)
第九讲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自我修订	(149)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治学态度	(149)
二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己著作的补充和修改 (1)	(152)
三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己著作的补充和修改 (2)	(155)
四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己著作的补充和修改 (3)	(162)
五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新的高峰	(167)

第十讲	关于马克思的失误	(170)
一	马克思关于中国“闭关自守”问题的提法	(170)
二	所谓“闭关自守”和“自由贸易”	(172)
三	所谓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造成中国仇视外国人， 实行“闭关自守”政策问题	(178)
四	海盗和明政府的海防政策	(185)
五	清政府的所谓“闭关自守”政策	(189)
六	评价明清对外政策时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193)

第一讲 关于几个一般问题

下面是我写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近代经济史专业1982年级的硕士研究生作参考用的几篇讲义。人们常说，科学家作出贡献是他们进行刻苦钻研所取得的成果。我搞了几十年的科学研究工作，瞎摸乱撞，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不知道怎样“刻苦钻研”法。以下所说只是提出问题，并非科学结论。

一 不过是家常

经济史是一门兼跨经济科学和历史科学两大门类的边缘学科。不言而喻，人们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和历史科学都有一定的修养，才能胜任这门科学的研究工作。我本来是一个在旧社会接受资产阶级经济学训练的蹩脚学生，只学到一些替资本家算帐的技术，没有受过史学训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然而在五十年代初，我却受命搞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资料工作。要说我三十多年来根本不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去指导自己的工作，未免有点冤枉。但是当时的学风对我的影响极大。我孜孜用力于语录摘抄，不求甚解于理论思维，用零碎捡来的历史资料去填充语录搭成的框架。这样做，当然谈不上作出什么贡献。直到现在，我还是不太懂得究竟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去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看来，所谓“刻苦钻研”的第一件事情似乎应该是“钻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

我以为，科学研究工作，本质上乃是创造性的工作，也就是

探索新的规律的学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授予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的模范共产党员的称号时，把孙冶方同志的治学态度归结为六个字，即“不唯上，不唯书”。不唯上，当然不是反领导，而是不看长官的脸色决定科学问题的是非；不唯书，当然不是反马列主义，而是不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当成教条。唯上唯书，科学就完结了。

说到这里，我要当一回文抄公。大段摘抄别人文章，并不光采。不过我没法说的比抄的更好，所以便抄。

有一位同志在《人民日报》上纵论“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列举“突出的”优秀传统有三，即“爱祖国，爱人民的坚贞气节；不重名利，不怕困难，献身事业的治学精神；坚持真理，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关于坚持真理，刚正不阿的品格一条，文章说：

“坚持真理，刚正不阿，是要冒风险的。为此而丢了脑袋的事，也不乏其例。春秋时，齐国之相崔杼杀了国君，太史据实记载‘崔杼弑其君’。崔杼怕留下恶名，杀了太史。继任的太史又这样写，也被杀。第三个同样被杀。第四个照写不误。崔杼无奈，只好作罢。于是流传下来的《左传》里，不仅记载着‘崔杼弑其君’，而且写上了崔杼杀史官的罪行。正直史官的浩然正气，常使某些专制帝王也畏惧三分。宋太祖曾一怒用斧柄打掉了一位大臣的两个门牙，其人徐俯拾齿置怀中。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耶？’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上悦，赐金帛慰劳之。”其实，“上悦”是假，怕史官的直录才是真。

“不断地探索科学，勇敢地坚持真理，不随人俯仰，不任人方园，不唯上，不唯书，这是我国古代一些知识分子的宝贵品质。这种品质，难免招致锋芒毕露之议，惹出清高孤傲之讥，甚至带来贬官、杀身之祸，而他们仍然恪守不渝。”^①

但是，怎样坚持真理呢？这就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又不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至于怎样做到这个“既要”和

^① 穆福田：《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人民日报》1983年8月10日。

“又要”，那不外实事求是四个字。这就是我写这些讲义的中心思想。

新中国的胜利，引起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极大兴趣。1949年以来，外国所出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著作，远比我们的多得多。其中有不少是从西方中心论出发，歪曲历史真相的。作为新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当然有必要走上国际讲坛，和这些谬论进行面对面的较量，战而胜之，争得那种和我们伟大祖国的崇高声誉相称的国际地位。这是我对青年的一个殷切希望。

科学方法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思维方法的哲学问题。我不懂哲学，不能从那么高度去谈问题。同时，我的语文工具很不够用，过去的长期的政治动乱又浪费了许多时间，所以我对国外新兴的科学研究方法一无所知，我的知识严重老化了。但是，我既然已经搞了几十年的科学研究工作，也就有义务向青年说点什么。而既谈科学研究方法，也就必须对历史上的实际问题有所议论，否则就成了空对空。我对许多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心里并不踏实，所以我告诫青年，我非如来，青年切勿烧香。我所能自信的仅仅是下面我之所说，来自实践，卑之无甚高论，借此提醒青年，在科学研究工作中难免会碰到这些问题，最好要小心一点儿。我不过拉拉家常而已。家常包含经验。经验可以是好东西，经验主义肯定是坏东西。

这里附带声明一点。过去，我对研究所以外的任何青年的任何文章都不提任何意见。这是因为自知谫陋，深恐把青年引上歧途。我认为，我对中国近代经济史这一行既很谫陋，就不该充当这一行的教师爷。但这些讲稿已流传到院外去，所以也就公开出版了。

二 历史出科学

有的青年问我，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有什么用？马王堆的女

尸和秦始皇陵的兵马俑是到1949年以后才发现的，在那以前，我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些东西的存在，然而我们照样推翻三座大山。可见这些东西的存在及其研究对革命斗争的胜利毫无用处。中国近代经济史上没有联产责任制这类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委实毫无用处。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进行了几十年的政治斗争。在此同时，他们还写了许多历史著作。恩格斯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又写了《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语言》。原始社会里没有现代无产者这个阶级，德国古代语言里没有共产主义这个概念，恩格斯为什么要写这些著作呢？把撰写这些著作的精力放到现实问题的研究上去，不是更有用得更多吗？看来恩格斯的目的是通过这些著作，更加有说服力地论证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而这些理论原则乃是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这些看来毫无用处的著作很有大用。不然的话，为什么毛泽东同志斥责“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①呢？

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科学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②。另一种说法是，“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③。前一种说的是广义的历史科学，后一种说的是狭义的历史科学。恩格斯说，“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④马克思是继承了这种“巨大的历史感”去研

①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页756。

②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3，页20注。

③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附录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13，页526。

④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附录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13，页531。

究人类史，才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

历史感或历史观念是一切科学研究所必须具备的基本观念。这个道理很简单，既然人们探索的是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那就必须从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去探索。生物学家除非从事生物的发生、发展、灭亡的研究，就谈不上生物的发展规律。地质学家除非从事地层变化的研究，也谈不上地质的发展规律。就连物理试验和化学试验也是观察物质的变化才能得出物理和化学规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科学也是历史性的科学，或历史科学。

科学研究无非采用两种方式，历史的方式，或者逻辑的方式。为了避开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不致打乱思想过程，“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维过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①。“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②

这里说的是“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逻辑的发展……需要历史的例证”。可见，任何问题，都要带着历史感、历史观念去进行研究，才能成为科学。所以说，历史出科学。

如果历史性的研究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那么人类史的研究就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科学。聂老师说，“现代科学技术是复杂的，要采用多种途径，不能‘一刀切’。不应该排斥基础科

^{①②}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附录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13，页532、535。

学的研究。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研究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要看得远一些，不能因为有些基础科学的研究一时看不到经济效果就轻视它。基础科学研究是应用研究的基础，只要应用科学的研究，没有一定的基础科学研究是不行的”。^① 聂帅这里讲的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问题，道理也适用于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如果历史科学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科学，那么，认为历史研究一时看不到它的效果就轻视它，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世界上有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不研究自己的历史呢？

三 普及和提高

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是普及呢？还是提高？我认为，既是科学研究的专业工作者，主要的任务就应该是提高，而不是普及。我认为称得上是科学研究成果的著作，至少必须三“新”有其一。这就是，或者提出新的问题，或者提出新的观点，或者提出新的材料，对前人已经提出的旧观点进行更有说服力的论证。如果这三者一新也不新，只是抄袭前人的旧观点，旧材料，炒冷饭，那就称不上是科学研究成果，做得好，也只是普及的著作。我并不反对普及著作，如果科学家也做些普及工作，当然是好事。但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青年，却应趁精力旺盛之际，把主要精力放在提高上，须知提高是非常费劲的事情。

有两句话，说是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前一句话说的是把科学家所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压缩改写成非专家所易于接受的形式。任何学科都包含许多方面的许多专门问题。科学家对这些专门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作出超越前人的新成就。这些著作，多半资料丰富，论证细致，小题目，大文

^① 《红旗》1982年第24期。

章，为数众多。这不是非专家有那么多的时间去一一通览的著作，也不是他们所易于接受的表达方式。所以需要把它们加以综合，压缩，取其最必要的论据和最主要的观点，以通俗易懂的文字，写成广大读者所易于接受的小本著作，普及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这种著作当然并不排斥新问题，新观点，但是它的主要任务是传播最新研究成果。这就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

所谓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需要作具体分析。普及和提高，都有不同的层次。小学教育不普及，中学教育的水平就难以提高；中学教育不普及，大学教育的水平就难以提高；推而广之，全国人民大多数还是文盲半文盲，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就难以提高。如果说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指的是这种普及和提高，那当然是正确的。

但是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似乎不完全是这样。首先，高等院校和研究生院号称是培养高级研究人材的地方，其实就我们的情况而论，这不过是传授基础知识的地方，就是基础知识的课程也不很齐全，就连文字工具的训练也不太够。要在科学研究上有所突破，还需要补充不少的基础知识。

其次，任何工作，都有它自己的规律，科学研究工作也不例外。向来科学研究上的重大突破，都是科学家继承前人的成果，按照科学研究工作的规律进行独立钻研的结果。现代自然科学的重大突破，例如原子科学上的突破就是由少数科学家在过去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独立进行高度理论思维的产物，甚至常常是首先在抽象的理论思维上作出了突破，然后再经科学实验加以证实的。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都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高度理论思维的产物，没有一项来自工人农民的思想。

恩格斯说过，“如果德国人象我们在1845—1848年那样懂得理论的话，那末他们就应当根据自己的理论去行动，他们应当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真正的普遍性的运动，实事求是地考虑运动的

实际出发点，并通过下列办法逐步地把它提到理论高度：指出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遭到的每一次失败都是原来纲领中的各种错误的理论观点的必然结果”。^①这里说的是，首先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这种理论去检验工人阶级的普遍性的运动实践，找出实际的错误来源于错误的理论，并不是工人阶级的普遍性运动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马克思曾经说过“使一门科学革命化的科学尝试，从来就不可能真正通俗易懂”。^②（着重点是原有的，下仿此）不可能通俗易懂的科学，哪里有什么通俗易懂的普及之可言呢？那种以为做到了普及就能得到提高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四 治学作风

科学研究工作是为探索真理所进行的艰苦劳动。这有一个治学作风问题。探索真理是根据客观实际探索事物发展规律的事情。事物的发展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只有采取纯粹客观的态度去进行研究，才能发现。我们不要客观主义，不能不要客观。这种事业和任何主观私心绝对不相容。要当科学家，首先必须做老实人。

古往今来，颇多见多识广之士，但探得真理的就不那么多，其故就在于许多人的治学作风，心眼不正。这种人把科学研究工作当作进身阶梯，为猎取功名利禄而舞文弄墨。他们摆事实，则夸大缩小，弄虚作假；论是非，则随风转舵，颠倒黑白。他们剽窃抄袭，掠人之美以抬高自己；断章取义，篡改文献，为打击别人而捏造论据。有些报刊是以人取文的，于是有些小有地位的人就特别喜欢和别人合写文章，利用自己的权势为文章找出路，

^① 1886年12月28日《恩格斯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页475。

^② 1862年12月28日《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页170。

把对别人文章只提了那么几条不疼不痒的意见说成是大有份量的实质性贡献，列名于作者之首。其尤甚者，则利用自己的领导地位，把那种自己一窍不通的著作，据为己有，遇到作者有所不乐，则打击报复，大施淫威。诸如此类的论坛蛊虫，当然谈不上艰苦劳动，更谈不上真理。

以后我还要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治学风问题。这里我只就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怎样进行艰苦劳动，略说一二。

大家知道，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奋斗了终生。他们为了论证这一伟大事业的必然性和必胜性，在理论研究上，也奋斗了终生。马克思是抱着这样的心情进行理论研究的：他认为即使是自己所完成的最好的著作，对工人阶级来说也还是不够好的，如果向工人阶级提供的不是最好的东西，那就是犯罪。正是由于抱有这样的伟大胸怀，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理论研究上，全力进行艰苦的劳动。

1844年11月19日，青年恩格斯报告马克思说，“目前，我正埋头钻研英国的报纸和书籍，给我的那本关于英国无产者状况的书搜集材料。我想，到（明年）1月中或1月底就可脱稿，因为我已在最近一两个星期完成了最困难的工作，即整理材料的工作”。^①这里，恩格斯把整理材料的工作看成是“最困难的工作”，而他在1844年11月中旬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之后，还在继续收集材料。

1858年2月22日马克思在发给拉萨尔的信上说，他正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书稿，进行加工，“进展很慢，因为多年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些题目，一旦想最后清算它们，总是又出现新的方面，引起新的考虑”。^②这里，马克思对已经写成初稿的多年研究成果，到最后定稿时又发现新的方面，需要做出新的考

^① 1844年11月19日《恩格斯致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7，页11。

^② 1858年2月22日《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9，页53。

虑，可见马克思是以何等严格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研究成果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了进行理论研究，总是尽一切可能搜集他们能够得到的一切有关材料，其工作量之大，是十分惊人的。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发现，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遗稿，单是在1861—1863年所写的就有四开本1,472页。^①在《资本论》里，马克思引用和提到过的著作共达505部，所用的议会报告和其他官方文件凡59种，报刊56种，其中包括长达40多年的《泰晤士报》，几乎每年都用。列宁为了撰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参考了几百种基本上是用外文出版的书籍、学位论文、小册子、报刊上的文章和统计汇编。列宁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包括从148本书（其中德文的106本，法文的23本，英文的17本，译成俄文的2本）和49种期刊（德文的34种，法文的7种，英文的8种）上的232篇文章（其中德文的206篇，法文的13篇，英文的13篇）中作的摘录。”^②

尤其令人起敬的是，1870年6月27日马克思告诉库格曼说，《资本论》第二卷的整理工作，整整中断了一个冬天，“这不仅是因为我生病。我发现有必要认真学习一下俄文，因为在探讨土地问题时，就不可避免地要从原文材料中去研究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关系”^③。在探讨土地问题时，为了根据原文材料去研究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关系，马克思认真学习一种新的外国文字，而这是在马克思既有病魔缠身，又届五十二岁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情！

难道青年不该学习马克思的治学精神吗？

① 恩格斯：《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四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2，页588。

②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说明，页XVⅡ。

③ 1870年6月27日《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32，页672—673。

五 史料问题

以后我还要回到史料问题上来，这里只说点至今还未引起人们充分注意的外国史料问题。

在中国近代史上，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最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处于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主义侵华史，就是中国近代史。就经济史而言，情况更加如此。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归根结底都是为的从经济上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的。就是由于这样，所以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国近代经济史，如果只利用中国方面的史料，忽略了外国方面的史料，那就只能算是研究了这一“最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而忽略了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我认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必须充分利用外国有关中外关系的史料，所有和近代中国有过关系的各国史料，都要利用。如今研究国际关系史的著作，要是不利用有关国家的外交部档案，就称不上是科学著作。在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上搞“闭关自守”，在国际论坛上谈不上争得地位的。

外国所藏有关中外关系史的材料，份量庞大，主要是出自外国人之手的公私两类文献，也有少量材料是从中国盗窃、掳掠去的汉语文献。就我对英国公私两类文献所得的远不全面的印象，可知英国官方所公布的文献主要是英国议会上下两院的辩论记录和蓝皮书两大类。马克思主要就是根据这两类文献揭露英国的侵华罪行的。

所谓蓝皮书虽是英国官方公布的文件，也包括非官方文件。蓝皮书包括“往来公文”(Correspondence)，“报告书”(Reports)

“文件和数据”(Papers and Accounts)四大类。“往来公文”主要是英国外交部和英国在华官员之间的往来公文，其中还附有外交部和有关各部的往来咨文以及私人或工商团体提交给外交部的